

SHIXUE ZAI SIXIANG

史学在思想

雷 戈 著

SHIXUE ZAI SIXIANG

史学在思想

雷 戈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在思想/雷戈著.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649-0469-2

I. ①史… II. ①雷… III. ①史学—研究—中国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1400 号

责任编辑 刘小敏

责任校对 田肖红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诚和印制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28.75

字 数 414 千字

定 价 43.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对“历史性”概念作了细致的分析；对历史与传统的关系、历史与思想的关系、历史与史学的关系、历史观与史学观的关系作了独特的批判性思考；对中国人历史观的特点作了新的辨析；对历史研究与法律实践的关系作了全新的阐释；同时，对“新史学”的观念和结构作了明确规范；对“当代史”的理念进行了深入思辨；对历史智慧、批评话语的特质作了富有新意的阐发；最后，通过中西史学精神比较，揭示了史学求真与客观意识的内在分殊，指出中国史学需要在求真的基础上发展出真正的客观性原则。

自序

一

史学是否思想？史学如何思想？绝对是一个本质问题。不过大多数人却关心：史学是否科学？史学如何成为科学？

西方近代以来，史学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使史学成为科学？于是，“历史科学”、“科学历史观”、“科学方法”等便成为历史学的关键词。科学成为推动历史学学科建制和观念建构的主导力量和基础标准。在历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中，是否因此丧失了某些更为深刻和有价值的东西呢？这种反思，并不意味着史学必然“去科学化”（因为史学是否科学还是一个问题），更并不意味着史学必须“国学化”。

在这里，需要一种基本的史学史意识。对此，我有四个基本判断：第一，研究历史而不懂史学史，就如同使用机器而不了解机器的制造原理，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对其学术境界的提升，无疑是一个瓶颈。因为，史书的编写程序，以及其所依据的价值理念和其所依托的权力体制，总体地构成了一个认识历史的知识框架。相形之下，把握框架是其大，利用框架中的具体史料研究历史是其小。第二，如果没有史学史意识，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的认识就不大可能超过最近五十年的一般水平。而最近五十年并不能真正反映出一种开创性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念的实际价值和影响。但从史学史角度看，人们首先看重的还是历史理论和史学观念的突破和演进。至于那些具体性的

研究和结论反倒退居其次,无足轻重。第三,当代中国史学的变化已深刻改变了“史学史学科”的传统定义。其议题之多样,其关系之复杂,其脉络之曲折,其影响之深远,不但远远超出了史学史学科的一般界限,而且也超越了历史知识的普通边界,甚至跨越了现有的实际国界。这使得如何写中国当代史学史具有了近乎不可能的自我否定性质。毫无疑问,这对所有不盲或未盲的当代中国史家都是一个充满焦虑的自我挑战。第四,史学史意识本质上是一种发现的眼光和选择的能力。它要求史家能够从侏儒中间寻找正常人,进而找到巨人。如果全部缺席,那也要主动拉开与侏儒的距离。无论如何,与侏儒为伍不能成为史家常态。这样,史学史意识便成为史家自我警醒的人格意志。

正是基于这种深刻的史学史意识,我们才能准确评估当今史学提供的某些事实的真正价值,并给出一个超出史学界俗论的史学史认知,进而从史学史秩序的自我调整中逐渐确认历史学的未来走向。这就要求人们必须对史学呈现的某些事实所造成的思想冲击效应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因为它足以改变人们的惯性历史结论,甚至基本历史观念。事实改变观念,应该也是一个事实。否认事实的重要性一般有三套词汇:现象与本质(质),个别与普遍(量),偶然与必然(度)。可有一点人们无法否认,事实是人选择的,观念是人制造的。事实与观念之间是人与人的关系。

在事实与观念问题上,人文学科划分出了清晰而严格的界限。以吃为喻:史学制造饭桌,哲学制订菜谱,其他社会科学制作食物。饭桌的尺寸、样式就前置性地规定了食客的多少和身份,使得某些菜肴不能端上桌。这个比喻说明,历史研究的特性虽然是时间,但史学正在创造着越来越大的思想空间,它为各种人文社会学术提供了一个最具包容性的共识平台,使之得以天马行空地自由驰骋。

史学从不为难死人,它只是让活人难堪。我觉得,史学不像是在平整的棋盘上下棋,而像是在凹陷的空间攀岩。所以,史学对思想的挑战性永远不可低估。史学话语蕴含的颠覆性能量永远不要轻忽。宏大的历史真理永远具有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

在历史领域，大真理从来不是来自史料（史料只能产生小真理），甚至也不是来自理论，尽管它有很强的理论性，常被人视做某种“历史哲学”或“方法论”。就其本质而言，大真理只能产生于现实（历史本身）。这种真理往往最初始于一个问题，或一种直觉。所以，历史大真理内在地包含有一种问题性和直觉性。

历史本质不能自动显现出来，也不能通过史料或思想显示出来，只能通过现实显露出来。所以，史学要求人们睁眼看现实。其他学科也让看现实，但看的只是现实某一部分。史学要人看的是整个现实。可见，史学对现实的观看具有一种整体性。这种整体性塑造着思想的一般规模。思想没有边界，但有极限。史学展示的事实已经缓慢而有力地扩大了这个界限。在思想界限的自由扩展中，现实不能当做证据直接用于历史分析。现实只是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最为广阔的思想空间。

历史研究好比历史学家在现实世界进行的死亡拼图。验证其真伪的办法就是继续拼下去，或换一种拼法。事实上，历史研究就是按照研究主题的需要，把能找得到的史料拼贴到一起，构成一幅尽可能合理（真实）和完整（客观）的画面。所以，史学实质是一种思想拼图的智力游戏。

考史而不著史，就如同只捡砖头而不盖房子。如果他只是个人爱好，我没意见，但如果当做职业，就成问题。如果一个作家只限于搜集素材，并不厌其烦地注明每条素材的具体来源和生活原型，肯定没人会说他是一个作家。可史家似乎就有权利这么做，而且常常被人看做是一流史家。也许人们会说，文史不同。可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文史没啥不同。至少文史都要说明一些事情，都要谈论一些问题，都要表达一些看法。可见，文史之别被人夸大之后，往往会导致一些荒诞的结论。

有时记者能写出一流的史学著作，有时作家也能写出优秀的史书，反过来，似乎不见史家能够写出好新闻或棒小说。这种现象恐怕不能简单解释为研究历史的门槛比较低，所以人人都能随意进入。我倒觉得这正表明了历史研究的最大开放性。历史内容的无限性要

求史学必须具有最大的思想空间。所以，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到此一游。但来此之前，他必须准备着随时经受最坚硬的事实的严酷打击。

史学所呈现的事实，正在改变中国人的观念格局。有人因此失去原来地盘，成为丧家之犬，以胡搅蛮缠为乐；有人将本土大补丸炒作得美轮美奂，夸口是横扫西学的独家绝技；有人趋于极端，通过制造新式大话，在中外官民之间表演其娴熟的二皮脸艺术；有人出洋入土，混得一身好手段，成为官家护院的世外高手；有人自娱自乐于纯正学问，将犬儒秘籍浸淫得浑然天成，不着痕迹。

所以，史学如何思想，仍然是一个更为本真的问题。

史学如何思想，意味着，史学既不必然具有思想，也不必然排斥思想。同时，史学也不是追求思想，而只是努力思想。因而，史学在思想，就成为一种史学的期待和思想的召唤。

在历史—现实的共同挤压下，人们必须使劲想。不断挑战思想的极限，是研究历史和创造历史的共同要求。研究历史改变思想，创造历史改变现实。其实，研究历史本身就是思想，创造历史本身就是现实。

我喜欢无法无天地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就能翻天。只是思想想着想着就把自己想成了天下。这种一念之差表明了思想的自我中心和欲望膨胀。确保思想从虚幻的天下返回到切实的脚下，是史学在思想的本真体现。

我对思想的基本要求是：第一，不能伪善；第二，不能虚夸；第三，不能别扭。有些说法听着不错，但总让人感觉别别扭扭。这就不好。我相信，只有凌空嘘气而无泥土气息，绝对不是一种能够生根发芽的好东西。

二

历史感与正义感正在成为同一种东西。

人性与自由都属于正义感。

按照罗尔斯的看法,正义感是人天生的基本感觉。

准确,而不是正确,是我对历史学家思想能力的基本要求。这正像我要求史学界的秩序是正常,而不是正确一样。

什么才能保证历史学家准确判断历史?没有什么能真正保证这点。不过,正义感似乎可以帮助实现这点。

三

旧历史思维模式:历史→现实→历史。逻辑是,通过研究历史,为现实提供借鉴;进而,根据现实需要,去重新认识历史。

新历史思维模式:现实→历史→现实。逻辑是,依据现实去创造历史,进而,通过创造历史来改变现实。

前者是历史主义,后者是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坚持历史与现实的本体论统一。它相信,如果不能坚持历史与现实的本体论统一,无异于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脚踩两只船。结果只能是自我分裂自寻死路。

历史学家钟情于历史主义,很正常。只是他必须明白,历史主义旁边还有理性主义。最重要的是,历史主义之上还有现实主义。

我有一个本质判断,现实主义高于历史主义。

历史主义只是历史学家的信条,现实主义才是历史学家的信仰。

历史主义要求的是涵盖力,现实主义要求的是穿透力。

历史主义也可以理解为历史合理性,现实主义也可以理解为现实批判的意向性。

现实意向性不同于现实目的性。所以,现实意向性绝不是一个现实意图的问题。现实意向性本质上是一种建构性概念,而非投射性概念。也就是说,历史真相是现实意向性自觉建构出来的,而不是历史事实自我呈现出来的。所以,历史真相实质是现实意向。现实意向性内在支配和强力主导着所有历史观念、历史研究、历史知识的必然逻辑。

正是这点决定了历史主义不能自足。如果没有现实主义的奠

基,历史主义将变得无根而空虚。没有现实主义的支撑,历史主义将丧失最基本的价值判断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将为历史主义的价值判断提供一整套严厉的批判标准体系,而是说,现实主义的批判意向性仅仅意味着,你是否具有改变现实的基本意愿,即你是否愿意改变现实。

在试图改变现实的时候,不能对自己做出的这种努力抱有过于轻率的道德期待。因为,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现实的复杂性以及人性的必要限度。正因如此,我们不能将改变现实随意置换为改善现实。就其本来意义上,现实可以改变,但未必可以改善。因为,改变现实首先不是一个目的论问题,而是一个本体论问题。

这样,改变现实作为现实主义的本质要求,构成了每个人实际生存的本体论规定。但从另一角度看,如果不想改变现实,现实主义将变得无力,甚至无用。进而,毫无价值的现实主义则无法给历史主义提供任何必要的价值凭据。于是,历史主义必然退缩为权力辩护主义和政治投机主义。

在这种逻辑中,现实主义的变质导致历史主义的贬值。现实主义的虚妄造成历史主义的虚伪。即先有伪现实主义,然后才有伪历史主义。

所以,伪历史主义本身不值得惊奇。只需将伪历史主义还原为伪现实主义,一切花哨的学术把戏都会变得稀松平常。一个不愿改变现实的人,除了一头扎进历史的裤裆,也实在没有别的去处。

于是,历史必然合理就成为伪历史主义的金科玉律。伪历史主义把历史合理性绝对化之后,宣布数千年的历史本身就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深刻和价值。可问题是,总不能因死猪不怕开水烫就说它生命力超强。

其实,借长度说事并非历史主义的长处。因为历史主义有两种:文本历史主义和现实历史主义。前者把历史看做走过的足迹,后者把历史看成行走的道路。文本历史主义一般都是先入为主地强调现实的合理性和历史的正当性。文本历史主义的手法不是发现问题,而是制造问题,然后取消问题。由此完成了一次冠冕堂皇的学术之

旅。

文本历史主义也叫历史合理主义，现实历史主义也叫历史批判主义。前者一分理智，二分伪善，本质上是辩护主义，也是浅薄的历史主义。后者才是真正的历史主义。

历史合理主义的逻辑是：既然如此，必然如此。就历史主体而言，它否定了自我选择和自由意志；就历史客体而言，它排除了偶然性和其他一切可能性。其最唬人的杀手锏是，把必然性拉扯到远不可及和深不可测的地步，告诉人们似乎存在着一种超出理性的巨大必然性力量和绝对必然性结构。至此，必然性就成为拒绝一切解释和质疑的神秘的非理性之物。

故而，历史合理主义便成为最不合理的历史主义。

四

历史学有两个基本命题：（1）历史学的认识论命题：历史学不能改变历史实际，但能改变历史认识；（2）历史学的本体论命题：历史学不能改变历史，但能改变现实。前者给人以知识的乐趣和惊奇，后者给人以生活的期待和尝试。所以，历史学既有最大的理性想象，又有最多的感性创造。

两个命题也是两件事情。我同时做了这两件事：一方面，整合历史与现实，让历史归现实，让现实归历史；另一方面，区分历史与史料，让历史归历史，让史料归史料。“历史即现实”，把不可能整合的两种东西整合起来了；“史料即语言”，把不可能区分的两种东西区分开来了。

在统一历史与现实以及区分历史与史料的基础上，我对历史学提出了新的理念设计。人们强调历史学的实证性，我强调历史学的批判性；人们强调历史学的经验性，我强调历史学的实验性。所谓实验，就是对思想能力的检验。它要求挑战思想的极限。挑战思想极限的含义是，我们究竟能把问题思考到什么程度？比如，我们能否把历史钻头打进现实底线，就是挑战历史思想的极限。

史料是史学的必要条件,思想是史学的充分条件,现实是史学的充要条件。

这就有了新史学的三个命题:历史即现实、史料即语言、史学即思想。这三个命题的逻辑是,在历史与现实本体统一的基础上,明确史料与历史实际的本质界限,通过解释史料,创造新思想。

新史学认为,人创造历史不是一种自然过程,人书写历史也不是一种自然本能。贯穿其中的是创造和自由。正像人创造历史不是为了适合自然状态,人书写历史也不是为了符合历史原貌。极端意义上,写史就是为了和历史不一样。因为其中蕴含意义。这意义不是史家主观赋予,也不是历史客观呈现,而是自由思想。

新史学空前强调了历史的挑战性。历史在双重意义上挑战人的智力。一是挑战人的记忆,因为存在过的历史正在被人可怕地忘记;一是挑战人的想象,因为发生过的历史超出了人的想象极限而受到蔑视。比如,春秋只有诸侯史,而无天子史,所以我们只能看到国家,却看不见天下。唐朝后期,只有朝廷史,而无藩镇史。于是我们的历史眼光就缺乏一种地方感。倘若春秋和唐朝后期置换一下,我们的历史叙述和观念会发生哪些变化?这个假设说明,我们之于历史,实在还缺乏想象。

史学想象如何改变历史对象,对绝大多数史家来说,依然难以想象。但我深信,研究过程必然会改变对象状态。比如,研究面前一张桌子,不能只绕着桌子看看就算,肯定会用手摸摸,还会把桌子搬起来掂量掂量。这样才能保证对桌子有一个更为实在的感知。这个过程显然已经改变了桌子的存在状态。这是对象存在的情况。至于对象不复存在的情况更是如此。比如,历史事件已经结束,研究历史事件已不是简单地改变历史事件状态的问题,而是如何确保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历史事件状态的干扰。因为本质上,研究历史就是运用理性的合理想象,那些史料(文献和文物)其实都是想象的道具。

悖论的是,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较之现代主义似乎更推崇想象;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比现代主义表现得更客观。一般的感觉是,现代主义更客观,因为它言之凿凿地宣称它研究的是历史,它使用的证

据是记载历史内容的史料,除了史料没有其他的历史客观实在;后现代主义更主观,因为它把所有历史都视为话语和文本,而历史话语和历史文本又都是一种典型的相互指证和自我指向的内部循环系统,它并不指向历史实在。但一般人却忘记,后现代主义(至少部分后现代主义者)同样强调话语和文本之外存在有真正的历史意义。如此对比,二者的客观性不难辨析。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与后现代主义同气相声,毫无分歧。主要表现在:(1)严格区分历史本身的可理解性与历史实际的不可知性的性质与限度;(2)强调史料性质而不是文本属性(历史著作);(3)严格划分史料与历史实际之界限。后现代主义的整体缺陷是:(1)没有首先确立作为现实的历史本身之本体论基础;(2)没有明确论证历史本身的可理解性以及这种理解的深刻结构;(3)没有充分揭示历史本身与个人历史之间的内在关联;(4)没有系统论证历史本身对全部历史研究和历史阐释的客观规范性;(5)没有明确指出历史实际的空虚性和不可知性;(6)没有严格划分历史实际与史料的界限;(7)没有根本确立史料作为语言系统的自足性;(8)没有深入分析史料语言的游戏规则和性质;(9)没有真正说明在历史本身可理解性的基础上通过史料话语的游戏规则而形成的史学本质;(10)没有对作为思想的史学与作为语言的史料之间的复杂关系做出清晰界定;(11)没有自觉意识到历史研究的现实批判功能对改变现实的巨大推动作用。

考虑到古代史家主要关心用什么体裁/体例写史,现代史家主要关心用什么观点/方法写史,后现代史家主要关心用什么语言/话语写史,我的思想和意向不难明了。

五

从司马迁开始,把自己的历史书写行为同以前的历史书写行为联系起来,建构一种确定性的史学史序列成为必要,也成为可能。这使得他在书写历史时,能够有意识地返回到或想象到以前那个神圣的书写行为本身,从而确证和加强自己现在书写历史的信心。无论

“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还是“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都可以看做太史公心目中所向往的史学王国的宏伟蓝图和辉煌前景。史学王国有精神领袖，有实际统帅。前者孔子，后者司马迁。二人都把历史写到“今上”。这实际上确立了中国史书编纂的下限。至于中国史书编纂的上限，则为司马光所确立。由此建构出中国史学一脉单传的神圣谱系。《春秋》之后，唯有《史记》；《史记》之后，唯有《通鉴》。

相对前司马设定的历史开端，后司马划定的历史开端更为深刻。《通鉴》虽是编年体，但却以周天子的无奈和妥协作为全书的开端。这个姿态性事件标志着权威的丧失、秩序的崩溃，即一个绝对的乱世。《通鉴》的结束恰巧也是乱世的终结。可见，司马光对历史的处理手法是，始于乱而终于乱。这暗示出司马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念，最有价值的历史乃是乱世之史。社稷不幸诗人幸同样适用于史家。

尽管如此，《通鉴》却开启了一个贻害至今的恶劣先例。这就是不把通史贯通当代。虽然皇甫谧《帝王世纪》未写“今上”，但他身为晋初人氏，写至魏末还算过得去。司马光作《通鉴》时，赵宋开国已有百年，不涉本朝实在说不过去。最离谱的是，郑樵《通志》作为《史记》之后流传至今的唯一一部纪传体通史，竟然在纪传部分中将距离自己最近的五百年全部删去。既然唐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那么本朝国史就更是想都别想。现代史本来是史家大有用武之地的三长所在，郑樵却弃之不顾。郑氏标榜“会通”，看来只是有“会”无“通”，光“会”不“通”，一句话，“会”而不“通”。以他不俗的史识、不凡的史才，当代人写当代史，怎么写都有价值。这五百年的近现代史本来应该成为《通志》中最具魅力的闪光之处，却被郑樵自己搞成黯淡无光的十足败笔。章学诚虽作“申郑”“释通”为其辩护，却对此不置一词。可见通史回避当代已成中国史学共识和定制。郑樵这种买椟还珠式的写法，将一个史家的内心恐惧暴露无遗。尽管郑樵本人也曾有过写到当今的打算，所谓“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著为一书”；尽管他也有相当的理由为自己辩解，所谓限于朝廷的形格势禁。但在史学史的流程中，这些徒有负面的意义。后人骂他是浅陋不学的“妄人”。照我看，他更像是无识无胆的庸人。

正可谓“有贼心没贼胆”。这倒也合乎常情。“贼心”常有，“贼胆”不常有。这可以引出一个史学判断，胆量决定见识，勇气决定价值。在某种意义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史学上确然可以成立。

如果说司马迁是被阉割，郑樵则是自阉割。其挥刀自宫的高度自律，预示着中国史学精神的全面萎缩。不过应该承认，郑樵身上未曾完全丧失的强大创造力使其能够最终表达出对太史公的最高敬意。他以极富挑战性的强悍姿态重新摆放了司马迁和班固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位置。一龙一猪。一天一地。真神与伪神，真品与赝品。这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牌位秩序。这种果决的判断，使中国史学史的正统脉系受到前所未有的有力质疑。这在极致意义上昭示出，中国史学统系的本质精神在于将“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及“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三者间的内在张力融构为一种惊世骇俗的伟大统一。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通过与壶遂的对话，确立了自己与孔子之间的精神联系（尽管表面上是一种区分），从而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梳理出一个史家精神传承谱系即“史统”。班固在给司马迁作传时，删除了孔子与司马迁之间这种“史统性”线索，另外拽出一个左丘明，使之作为孔子的精神继承人。这样，孔—马史统就位于孔—丘史统。刘知幾在《史通》中虽写了“六家”，但所谓“《春秋》家”只是一种史体分类，无涉于史统谱系。郑樵在《通志·总序》中，对司马光修《通鉴》一字不提，反而宣称《史记》是“六经之后，惟有此作”，从而重新恢复了孔子与司马迁之间的史统谱系。

朱熹却说，司马迁写的盛衰成败“干你身已甚事”？说来说去“真是自欺”。这透露出朱熹眼中的经史分野所在。史学说的是别人的事，经学说的是自己的事。人们一般会说，史学说的虽是别人的事，但可以为我借鉴，这样，他人与我就有了关系。二者貌似有别，其共同点在于，都没有真正明白史学所说并非别人之事，恰恰是自家之事。

对自身历史缺乏意识和反思，却热衷谈论他人历史，好比“端着金饭碗讨饭”。因为你对他人历史说得再多，也无助于创造自己的历

史。这就好比你讨来再多的饭也没有金饭碗值钱。倘若有人较真，说金饭碗不能当饭吃。我要说，真要没饭吃了，金饭碗就能当饭吃。除非你把金饭碗扔到鲁滨逊的荒岛上。这又好比人自己的历史是一盘棋，前人历史只是棋谱。一百年历史是一百种下法，一千年历史是一千种下法。但成千上万种棋谱的最终价值还是要体现在每个人如何下好自己历史这盘棋。因为人不是先看棋谱再来下棋的，而是先学会下棋再来看棋谱的。

当然，没有史家因写自传而留名，正像没有作家因写日记而出名。这并非说史家或作家的私密生活和个人经历不重要（毫无疑问非常重要），而是说他不能把它当成自己的唯一写作方式。他需要做的是，必须把它融入自己的全部写作过程之中。

这就要求，真正的历史思维必须是：把每一个历史事件都与具体的自我个人直接联系起来，进而探讨自我个人在历史上的命运（因为历史思维必须赋予个人以价值与尊严），最终揭示这种个人命运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复杂关联。

终极言之，史学思维的本质是：对任何一件事，都必须首先求问：这对现实意味着什么（这种追问不同于“这对现实有什么意义”）？倘若有人说，其他学科（比如哲学、政治学等）也会这么问，这只能说明其他学科同样属于史学思维，也只能说明史学思维具有某种结构性和本质性。

有时，人们觉得认识现实比认识历史容易，因为现实近在眼前；有时，人们觉得认识现实比认识历史困难，同样因为现实近在眼前。相同的原因却使人们产生完全不同的感觉。倘若历史就是现实，我们是否会觉得认识现实与认识历史具有同样的难度？

把历史还原为现实，把现实还原为个体生命，把个体生命还原为普遍结构。这样，历史与个人的关系就超越自我而不离自我。

历史是人事，不思考历史，何以为人？历史是自己的事，不想自己的事，何以成为自己？

可见，数典忘祖是人之常情。“典”就是史料，是他人历史；“祖”就是历史本身，是自我历史。亦可知，一个最普通的常人身上也必定

同时存在着历史与现实、史料与语言、史学与思想的三重复杂关系。

历史即现实确保人的自由存在，史料即语言确显人的个体言说，史学即思想确证人的理性思考。

凡此，皆与人性、自由、真理相关。

人性、自由、真理三位一体。逻辑是，人本身包含身心，人身必须自由，人心从属真理。所以，依据人性，自由是其“身”之规定，真理是其“心”之规定。因而，我的历史一学原则就是身体力行。它规定了个体身位思考的根据与限度。这一合理限度是历史一学、哲学、文学，而不是政治、法律、道德。这就意味着，在思考政治、法律、道德问题时，简单依据个体身位进行判断是不适当的，甚至是危险的。理由是，历史一学、哲学、文学的价值具有高度的个体性，它依赖于个人经验的支撑；政治、法律、道德的价值则要求最大的普世性，它要求必须尽可能地摆脱个人经验的局限。所以，在谈论政治、法律问题时，总是拿个人经验说事，往往会言不及义。

政治问题上，“如果你没做过什么事，你就不能做某事。”法律问题上，“如果你经历过什么事，你就一定会这么做。”表面看，这是以个体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但由于它是假设式的，故而构成一种虚假的个体主义思维。本质上，这种思维只能是一种伪个体主义思维。与其相对，历史一学的个体主义思维要求，依据每人自己的真实生活和实际体验来思考历史和把握历史。这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个体主义思维。根据是，历史的最小单位是人，是个人。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内在理路即在此。

以水为喻，历史学思维并不是站在河边喟叹“逝者如斯夫”，不是问河源自何处，不是问河流经何地，不是问河流向何方，而是把脚伸到河里，或从河中舀出一瓢水，或在河边洗衣服，或往河里扔一块石头，或跳进河里，或在河里划船，或在水边垂钓，等等。这就意味着，历史学关注的是一个行动，是一个自己做出的行动，是一个包含有某种意图和意义的自主行动。重要的是，这种行动不管是否在当下发生，我们首先必须考虑到它对当下产生的复杂影响。所以，真正的历史学思维必然包含有个体主义方法论和现实主义本体论。